

公平竞争背景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路径

——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的应用

洪银兴, 桂林

[摘要] 本文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重点研究了在公平竞争背景下如何通过市场化途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国家能力的提升。国家能力充足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优良社会公共品,解决诸多重要社会问题,为国民经济托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加强国家能力建设的基本途径。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对国有资本有三大约束,即预算约束、产权约束和市场地位约束。国有资本的做强,既要遵循资本属性,又要依靠市场规律。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可促使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做强自身。国有资本的做优,不仅要求优化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行为,还要优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家选拔与激励制度,并优化国有资本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布局。借助资本积累特别是资本集中,国有资本可以快速做大。混合所有制是实现做大国有资本的具体有效形式,但要建立相应机制防范国有资本“化公为私”“脱实向虚”和资本无限制扩张等问题。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以削弱民营经济为代价,而是在公平竞争中与民营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相辅相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国有资本; 国家能力; 做强做优做大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21)01-0005-12

一、引言

公有制主体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即国家(全民)所有的经济,其依托的是国有资本。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国家能力提升。国家能力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绩效。^① 国家能力表现为国家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为社会提供各类公共品的能力,以及促进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能力。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起飞、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重要条件。从经济史看,在一个经济起点低、工业化起步晚的国家中,国家能力高低对于工业化能否最终实现影响巨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能力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国家能力建

[收稿日期] 2020-09-18

[作者简介] 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桂林,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通讯作者:洪银兴,电子邮箱:yinxing@nju.edu.cn。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 关于国家能力的重要性,Fukuyama(2014)指出,对于一个制度还不成熟的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政府,就不能解决有效制度的供给问题。Besley and Persson(2010)认为国家缺乏能力来保证税收增长与支持市场,是一国长期不振的重要原因。国家能力包括财政能力和法律能力,法律能力低下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而财政能力缺乏会导致低收入。国家能力不足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

设对于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至为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消灭所有制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所有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应该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有资本是国家能力的重要基础,而国有资本的规模和效益可以为政府提供社会公共品,并为解决社会重要问题提供物质支撑,国家能力的基础和依托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优势,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是国家能力的支柱。国有资本规模扩大和效益提高可以增强国家能力,为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物质保障,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源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②国有经济有利于支撑国家能力的提升,从制度上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践。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跨地区建设项目可以举全国之力得以完成,国有资本在其中起着重要骨干作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彰显了中国政府强大的国家能力,而这种举国体制的能力背后就是强大的国有资本力量支撑。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提出深化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求时进一步明确不仅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还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通过加快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

市场取向的改革实现了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首先,明确公有制经济不是指公有制企业,而是指公有资产,包括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在此基础上明确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企业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其次,在改革中一方面政企分开,将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分开,另一方面政资分开,将行政管理同国有资产管理分开,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由管企业转向管资产并进而转向管资本,这就从国有体制上解决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消除了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制度性障碍。“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③

事实上,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有做强做优做大的要求。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以削弱民营资本为代价。在混合所有制的框架内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不只是竞争关系,还存在相互持股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战略实施过程中,国有资本都是先行资本。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且投资巨大。由于基础设施属于长期投资,私人资本不愿意,通常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溢出效应强的公共品,私有资本通常供给不足,而作为公有资本的国有资本常可以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提供短期内低收益甚至没有收益的长期投资。这里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不仅不存在挤出效应,还能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开辟新的空间。

在已有的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对于公有制为主体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强调坚持上,至于如何坚持并没有做更为深入的研究。需要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靠保护而是通过竞争获得的。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仅需要以《资本论》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②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参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 中国青年报,2015-11-25.

③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第79页.

中阐述的资本属性为出发点,还要基于市场经济背景,在市场化改革中寻求做强做优做大的合理路径,明确并规范国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行。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指出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遵循资本运行规律做强做优做大,一是要坚持资本属性,二是要遵循市场规律。本文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研究:①在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嵌入国家能力的概念,并从这个角度阐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重要意义。②从马克思资本理论视角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提供解释,这有别于大多数基于西方经济学框架的解释。从马克思资本理论视角解读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应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钥匙”。③根据马克思市场理论,探求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环境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基本路径。

国有资本既然是资本,就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属性有五个规定。定义1: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定义2:资本是必要的生产要素。各种要素是被资本黏合或者并入生产过程的。“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①定义3:资本的本性是实现价值增殖。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定义4:资本是作为生命体的运动,资本的运动一旦停止,资本就不是资本。定义5:积累是资本的本性。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资本的这五个属性是一个整体。国有资本作为资本具备以上五个属性,只是第一个属性与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不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资本是指所有权归属全体国民的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资本的主要承载形式是国有资本。

现阶段研究国有资本的作用及其做强做优做大的有效路径,不仅要从小资本的资本属性出发,还要从其所处的市场经济出发。国有资本运行从而实现强、优、大的轨道只能是市场经济的轨道。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在公平竞争中取得的。在公平竞争背景下,应通过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并最终壮大国有经济来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

二、国有资本的做强

国有资本的做强,指的是增强国有资本的竞争力和增殖能力。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有资本的效益不高,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国有资产没有被作为资本看待,国有资本只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国有企业从而国有资本在经济效益和竞争力方面发生大的改观是在党的十五大明确国有资本也是资本的属性之后。资本属性最为重要的是价值增殖,不能增殖就不是资本。做强国有资本不仅需要按资本属性来运行资本,还需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资本。相应地,就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途径。

(1)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过去国有资本以国有独资企业为主要载体,但现在国有独资的企业已经很少,大多是国有资本控股企业。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国有企业需要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获取资源。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市场经济中提高竞争力的根本性机制是市场的优胜劣汰、奖勤罚懒的机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规定了公有制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框架,要在此框架内把国有企业培育成市场主体,需要强化竞争的基础性地位。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需要形成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697页.

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公平竞争要求在制度和政策上解决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地进入和退出市场问题。市场竞争机会均等,既不存在对何种所有制经济的保护和何种所有制经济的歧视,也不存在所有制倾斜政策。这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公平竞争需要强化对国有企业的三个约束:一是硬化预算约束。要树立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能依靠政府保护,而应该让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强自身。为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提供各种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放松等软性预算约束实际上是将企业的经营与风险承担脱钩,由此弱化竞争效应。只有硬化企业预算约束,才能强化竞争的基础地位,促使企业盯着市场而不是盯着国家,只能依靠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来保持和巩固其市场主体地位。二是强化产权约束。产权激励是市场主体活力的基础,即所谓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关系明晰能更好地促进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的产权利益来服从市场调节,促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以规避产权丧失风险、最大化资本增值空间为己任。通过产权的界定、配置与流转,明晰企业产权的归属与控制、收益与风险,可以把企业经营活动的效果和财产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产权激励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源。这是做强国有资本稳定持久的激励。三是强化市场地位约束。居于自然(行政)垄断地位企业所得到的垄断利润实际上是国家赋予的,因此垄断利润必须全部归国家。同时,对处于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采取必要的规制措施。这样,企业只能靠竞争能力和合法经营得到归于自身的收入。总之,国有资本不靠政府保护而靠平等竞争做强,国有资本才能直面足够的外部竞争压力和内在增殖动力,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根据市场需求优化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2)国有资本在多种实现形式中提高增殖能力。过去国有资本只有一种实现形式,就是在国有企业中实现。虽然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在竞争性领域许多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增殖能力明显不如非国有企业。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始于对国有经济准确界定为国有资本后,明确国有资本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不只是存在于国有企业,还可以进入非国有企业。相应地,国家对国有资本的管理由管企业转向管资本。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所强调的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的要求明确了做强国有资本的新路径,即在其多种实现形式中提高资本增殖能力。国有资本不再墨守于国有企业之中,国有资本可以退出不能盈利的国有企业,同时借助股份制进入能够盈利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只求所在不求所有,只求保证所有者权益。只要国有资本所在的民营企业做强,同样也就做强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其追求盈利的资本本性也能促进国有资本增殖能力的提高。

(3)国有资本在战略性调整中做强。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国有资本进入的主要领域是国民经济命脉部门,涉及自然垄断行业、稀缺性自然资源行业,如电力、石油石化、电信、铁路等行业。国有资本进入这些领域,既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也是为了国家能力的增强。从这一意义上说,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体现国有资本能力的增强。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国有资本分布过于分散,尤其是相当多的国有资本沉淀在竞争性领域中的低效益企业,而在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由于资本分散,存在许多薄弱领域。在国有资本明确为“资本”后,必然会提出国有资本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要求。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的规律是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流动和调整的导向。退出的资本集中投向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尤其是进入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薄弱领域,无疑能大大做强国有资本。国有资本退出的竞争性领域让给民营企业经营,效率更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更高。国有资本在战略性调整中退出的主要方式是企业出售拍卖和股权转让。根据马克思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企业出售,让渡的是使用价值,收回的是资本价值;退出不能增殖的领域,转向更能增殖的领域。国有资本不但没有私有化,而且具有明显的做强国有资本的效应。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国有资本并非一定要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在竞争性领域不是所有国有企业都是低效率的,也有一些效益好的盈利企业,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这类企业的国有资本不但没有必要退出,而且需要进一步壮大,甚至可以吸收非国有资本进入。

(4)处于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在规制改革中做强国有资本。自然垄断行业通常属于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经营这些行业,其控制力不是竞争力,只是垄断力。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所处的垄断地位是国家赋予的,不是凭自身的竞争力获得的,但靠行政垄断并不能做强国有资本。在自然垄断领域做强国有资本,需要防止和克服其利用垄断地位采取垄断行为,需要把这类企业更多推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其主要路径是推进政府规制改革。

Laffont and Tirole(1993,2001)针对自然垄断行业提出了激励性规制改革的思路,概括起来就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转向激励性规制。根据做强国有资本的要求,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改革的方向是将垄断行业中能交给市场的部分坚决交给市场,最大限度缩减完全(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措施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基于科技进步,不再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如电信行业,整个行业退出垄断行业并转向竞争性行业。相应地,在这些行业,政府规制要打破其行政性垄断地位。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渐趋于细化,产业分类也随之细化。原先需要政府规制的垄断性行业的生产环节并不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三是吸引非国有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进入自然垄断的国有企业。其效应不仅在于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更为重要的是在企业内部引入不同所有制的竞争,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四是给予被规制企业一定的确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的权力,这种权力和行为必须受市场规则约束。有市场规则约束的利润刺激以及竞争压力的刺激,可以更好地激励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这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服务质量具有积极意义。以上做强国有资本的路径可归结为两点:一是拥抱市场经济。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背景下,不以垄断行为谋求垄断利润,企业可在市场竞争中提升自身效率。二是遵循资本规律。国有资本要按照资本的基本规律来运作与运营。

(5)在夯实制造业基础与服务实体经济中做强国有资本。从行业类型看,国有资本主要分布在实体制造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在这两个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这两个领域的潜力,可以推进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实体制造领域,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广泛分布在核能、船舶制造、航空航天以及武器制造等重要行业中。这些行业基本处于制造业的上游,构成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对于其他行业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其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国民经济的质量。基础制造业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可以为下游产业提供成本更低、质量更高的生产资料,拓展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与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一国整体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从而助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有资本的另一个主要的分布领域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在现代社会,金融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向,作为虚拟资本的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核心。在我国的金融业中,国有金融企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要使得国有金融企业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助力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努力避免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减少金融资源不当配置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而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化金融改革。

三、国有资本的做优

国有资本的做优,指的是做优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使这些企业具有竞争优势,有更高的效率和市场活力。国有资本做优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优化国有企业(资本)治理结构,规

范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其注意力集中于经营好国有资本,让企业家真正成为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人事基础;二是优化好国有资本产业布局,特别是在高科技企业日益成为国家实力象征的当下,国有资本应为稳固未来的主导地位加强高科技产业布局。按此目标,做优国有资本更加关注国有企业的治理效能。其基本路径就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要求的,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各种要素的配置和组合是在企业治理中实现的。企业治理不同于企业管理,除了包含经营管理内容外,还包括企业内资产的组合、产权主体及企业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协调。

(1)优化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行为,科学确定政府和企业行为边界。政府的目标和企业最大化价值增值的目标通常不一致。若政府干预企业经营过多,会限制企业的经营权限,企业丧失活力,有损企业发展。另外,政府介入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会损害政府作为行业经营规则制定者的公正性。就国有资本管理改革来说,有相当长时期是政府直接管企业,虽然曾经推进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抓大放小”的改革,但企业并不能完全做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后来市场化改革明确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就转向了管资产。企业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但资产包括资本和负债,企业的负债还需要国家兜着,企业没有真正自负盈亏。现在国有资产管理转向管资本,不仅国家不再兜着企业负债,促使企业真正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而且国家按资本的本性即增殖和增值要求管理资本,作为出资人不仅“用手投票”,更是可以“用脚投票”。这就倒逼企业提高经营效率,保证国有资本所在企业能长期保持市场优势地位。优化国有资本所有者行为进一步要求,明确作为所有者的“国家”不应该是政府行政机构,而应该是国家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这些公司根据资产责任进行市场化运作。

(2)优化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这是做优国有资本的基础条件。影响国有资本绩效的主要因素不只是产权结构,还有治理结构。通常认为,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有效率,是因为私有产权所有者更关心自己的资产,而公有产权会有“所有权虚置”问题。然而,产权与治理结构一样,本质上也是一种激励机制。企业主亲自经营企业的古典企业模式现在并不占主流,当代大企业基本都是股份制公司,都是职业经理人来经营企业。即使是私有资本,企业主也囿于经营能力有限,通常要委托有经营能力的人来替自己经营资本,同样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国有资本属于全民所有,但全民都来经营管理国有资本显然不现实。国有资本也需要委托少部分人来经营决策,这必然使得国有资本经营中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上,只要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安排设计合理,国有资本同样可以获得出色的经营绩效,其效率不会低于私有资本。现代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安排通常也是企业资产所有人把企业委托给经理层来经营。委托代理式的治理结构安排是一种普遍的资本运作形式。实践证明,现代企业制度本身不具有所有制性质,是一种有效率的组织社会生产的制度安排,私有和公有性质的资本经营均可采用。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契约制度,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制度的核心,在提供激励和控制经营者行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出资者产权与法人产权分离的制度安排中,完善法人治理的关键是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一个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能协调好企业的股东、管理者、雇员、顾客和供应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并做好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的制度安排。

(3)企业家治理企业。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具有专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的素质和能力,是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完善公司治理需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熊彼特(1991)指出企业家及其家人的社会地位与企业的兴衰密切相关。

为了避免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进而导致企业家社会地位丧失,企业家需要通过创新来做优企业。作为企业家,需要具有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企业家的职能,并从两个方面来界定管理:管理既是参与创造价值的劳动,也是资本的职能。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① 马克思认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可能会有两种状况,一是职能资本家同时执行监督与管理职能的劳动,二是将监督和管理职能交给他人执行。“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② 这种专事监督和管理的就是企业家的职能。马克思还发现:“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能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借贷资本的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或多或少正确的评价”^③。可见,虽然马克思当时没有企业家的概念,但对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要素及企业家的成长还是有所察觉的,特别是关注其商业价值的评价。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做优国有资本要求国有企业着力科技创新,经营者不只是一般的企业家,还应该是科技企业家。科技企业家不仅具有科学家的视野,更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结合。

现阶段,国有企业对企业家的需求和要求同私营企业是一样的,甚至更高。国有企业经营者要能成为企业家,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是企业制度上的安排。除了赋予经理人充分的经营决策权外,企业的治理结构要设计出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的主要方式是经营者分享剩余,也就是拥有剩余索取权,承担创新的风险和收益。经营者就可能从自身利益来关心出资者的利益。为什么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创新精神往往不如私营企业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其创新活动既不能带来足够的创新成功收益,同时也不用承担创新失败风险。若在分配制度上企业经营者可获经营者股权,企业家可通过年薪、股份等形式参与利润分享与分配,从而个人收益中能体现经营者的管理才能及其投入,这必将鼓励其管理创新,促进更多的经营者成为好的企业家,并且克服经营者腐败。二是需要有科学的评价考核机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正确评价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的机制。要建立职业经理人的市场选择制度,必须要有职业经理人市场。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选拔过程中要加大企业经营绩效在聘任中的权重,从而激励职业经理人对市场负责,并根据企业的市场表现来确定经理人的价值。

总的来说,做优国有资本就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本经营体制,优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该治理结构要能充分约束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充分激励经营管理层以国有资本最大增殖和增值为目标治理和经营企业。

(4)提升国有资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和国际谈判中的地位,促进国强;核心技术竞争力能让本国企业站上国际产业链高端,赚取高(超)额利润,有利民富。

在公平竞争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贸易壁垒和行政垄断易受到多方诟病,而通过技术创新获取市场垄断地位具有较好的正当性,不易受到指责。马克思多次指出技术进步可以让企业取得好的生产条件,利于企业获得超额利润。“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384页.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431页.

③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679页.

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使用。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①“超额利润只能产生于一般生产价格和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因此只能产生于个别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之间的差额。”^② 国有资本要做优,除了加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外,还要助推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升级,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力促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占据头部位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地位,并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国有资本应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前所述,除了做好选拔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人即企业家的相关制度安排,国有企业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到技术创新的历史进程当中。国有资本参与技术创新有两条基本的路径:一是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到技术创新的国家进程当中,让国有企业成为国家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之一,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二是通过国有资本参股的方式积极参与并资助民营资本的技术创新,除了国有制造企业与民营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外,还要建立国有金融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有效途径,为此需要相应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改革。

(5)优化国有资本产业结构布局。国有资本在传统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具有雄厚的实力,这保证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如今高科技产业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出现和发展,高科技产业实力水平在国家层面的国力竞争中占据的比重逐年提高。国有资本需要在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国有资本可积极布局高科技产业,这与其自身优势有关:一是高科技产业基本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本,且技术更新换代快,这些对资本的周转和循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有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基础,这恰好符合高科技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二是高科技企业同时也是知识密集型企业,而高科技人才正是高科技知识及创新的支撑。国有企业不仅拥有高质量的科技人力资本存量,且可凭借其完善的员工社会保障制度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吸引人才,带来人力资本增量。无论是资金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国有资本都与高科技产业的需求相契合,具备参与高科技产业布局及发展的优越条件。国有资本做好高科技产业布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国有资产的天然要求。国有资本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到主导作用,需要与时俱进地跟上产业的发展,而非仅仅止步于当前的市场地位。优化布局高科技产业有利于国有资本在未来保持甚至增进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当然,国有资本布局高科技产业不应以挤出民营资本为代价,而应在民营资本无力或不愿意经营的溢出性大的基础性科技创新领域加强布局,为下游产业发展奠定底层科技基础。国有资本还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在内的多种国有资本实现形式参与民营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创新,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主导和助推作用。

四、国有资本的做大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国有资本不能做大。国有资本做大即扩大国有资本规模有其必要性:一是国家能力以国有资本的做大为基础;二是国有资本做大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当然,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国有资本的做大要符合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手段,同时要遵循资本运行的规律,反映规模经济的要求。当前所要追求的国有资本做大是在资本提高效益基础上的做大,是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做大。

(1)以国有资本积累做大国有资本。马克思提出资本积累指的是剩余价值资本化,也就是资本增殖的价值不是全部消费掉,而是转化为资本。这是马克思所说的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资本主义积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 265 页.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 724 页.

积累的规律,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批判资本主义积累,不等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有资本不需要积累。不能实现积累的资本不能称为资本。资本积累不仅是社会财富的简单集中,更是促进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基础。公有制经济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这是长期的国家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的。国有资本积累不仅表现为增加国家资产,而且要为人民谋福祉。“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①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以资本积累的路径做大国有资本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资本运行的目标不能只是为了增殖,还要实现资本增值,因此需要有明确的资本积累的目标和任务;二是资本增殖的手段(除了剥削手段外)同样也是资本增值的手段,特别是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管理、加快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等手段。

(2)以资本运作做大国有资本。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转向管资本为主后,相应的改革措施是组建各种类型的资本运营公司,其基本职能是运作国有资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这就提出了如何运作国有资本才能做大国有资本问题。根据马克思所述,通过资本积累的集聚,国有资本可以做大,但资本集聚的速度和规模都有限,难以满足激烈竞争市场环境下做大资本的需求。“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② 要快速大规模高质量完成资本规模的扩张,跑赢资本竞赛,进行资本集中是一条必选之路。资本集中是指把分散资本集中成为一个较大的资本积累,集中的方式主要是并购。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竞争和信用是集成的两个杠杆。竞争方式属于强制的道路。强制的道路即吞并。“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③ 平滑的方式即信用(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金融,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使用金融概念)。马克思指出信用作为一种崭新的力量,“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为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④ 马克思所指出的起资本集中作用的信用,一是股份制,“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⑤ 二是信用,在股份制基础上产生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是资本做大的重要路径。

资本集中只是做大资本的开始。马克思对此有特别的说明:无论采取哪种集中方式,“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⑥ 这就是说,在资本集中后对规模增大的资本部分进行科学处理、进行技术和制度的改造,不仅能做大自身的资本,同时也能增大社会资本。如果只是停留在并购上,不进行科学的改造和组织,不但做不大国有资本,还会因内耗和管理不善而削弱国有资本。

(3)以混合所有制做大国有资本。在过去的理论和实践中,国有资本只能在国有企业中经营,国有企业是纯而又纯的国有资本,结果是国有资本不但做不大,而且因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而越做越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第46页.

②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724页.

③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723页.

④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722页.

⑤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723页.

⑥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723页.

小。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理论进展是明确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资本和各种非国有资本相互参股的具体形式,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资本从股份制形式中找到了做大的路径。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路径包括:一是国有企业上市,在资本市场上吸收社会资本进入。在股票市场上活跃着的一大批国有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支配着相当数量的社会资本,成为了特大型企业。二是通过国有企业改制吸引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三是国有企业吸引本企业员工资本进入。所有这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使国有资本在控股、支配中做大。显然,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国有资本实现快速资本集中,放大资本功能,实现保值增值。不仅如此,非国有资本的进入使得外部竞争转变为内部的资本合作,形成资本回报的压力,可促进企业加强管理、提高效率,从而提高资本增殖能力和企业的竞争力。国有资本利用混合所有制的做大方式,除了吸引优质民营资本甚至国际资本加入的“引进来”方式外,还有“走出去”方式,通过参股控股方式进入民营资本以及国际资本经营领域。

在混合所有制中,国有资本作为资本不仅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还参股于非国有企业中。在参股的企业中,如果控股,对非国有资本就具有控制力和支配力;没有控股,也能得到所有者权益。不仅如此,民营经济对国家能力的贡献中也有国有资本的作用。当民营企业经营领域效率下降影响国家能力时,国有资本可以进入并支撑该领域的生产,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而当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效率提高时,国有资本可以从相关领域特别是竞争领域退出。由此,国有资本可以发挥国民经济的托底和稳定功能。

国有资本通过资本市场途径做大,会带来产权交易问题。产权交易也就是所有权交易。做好国有资本参与的产权交易需要处理好以下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国有产权交易时要防止“化公为私”问题。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制度经济学所指出的,公有资产交易的参与者对公有资产没有自身财产利益关系。在交易时公有产权被低估,私有产权被高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产权交易的安全性和防风险问题,尤其是要防止产权在交易过程中流失。诺思(1994)指出:“私人所有者之间通过市场契约转让的产权必须是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必须是可度量的,而且必须是能行使的。”如果企业债务缠身,即使该企业股价再便宜,也不会有多少人入股或购买。中国的一些企业海外并购只关注购买的股价而不关注所购买企业的债务和员工权益,往往是血本无归,这就是教训。克服这些状况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产权交易在公开规范的资本市场进行。由资本市场来客观评价参与交易的属于各种所有制的资产价值,参与交易的各个所有者的资产就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对国有资本来说,通过资本市场,可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实现产权交易。二是国有资本由拥有独立经营决策权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进行授权经营。这些公司承担国有资产责任并且真正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营,从而使国有资产真正有人负责。

第三,国有资本做大还有形态和结构问题。就经营性资产来说,有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之分,需要明确重点做大的是实体资本。现代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信用经济。基于信用经济,可衍生出虚拟资本和相应的虚拟经济。虚拟资本在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但国有资本的主体形态应该是实体资本。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以证券方式存在的同一资本有双重作用:一是作为实体资本在生产经营过程发挥作用,而企业获得了其法人财产权;二是作为纸质证券形式的资本所有权证书。一旦资本取得股票、债权等虚拟资本形式,就具有了其独立运行规律。“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①“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541页.

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①这意味着虚拟资本出生于实体资本,但它是投机性经济。马克思指出: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和增值不依赖于其实际价值,一国的真实财富在这种贬值和增值以后不会发生实质改变。

第四,防止资本的无限制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处提到资本无限扩张后导致经济危机问题。近年来实践中出现了某些资本利用资本市场扩张冲击实体经济问题。同样数量的追加资本面对同一实体企业,一个资本行为是在实体企业中用于技术投入、人力资本投入、购买原材料等,费了很大劲不见得马上能见效;另一个资本行为是在资本市场上购买该实体企业的股票达到控股该企业的标准。如果以资本力量为由肯定后一种资本行为,这种资本力量最终会扼杀实体企业。对这种资本扩张行为就得限制。国有资本不能靠虚拟资本的增大而做大,社会财富也不可能靠虚拟资本增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资本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托底和支撑的作用,扮演国民经济运行中坚力量的角色。这样的定位也让国有资本坚守实体经济做大底线,防止和克服“脱实向虚”的现象。

五、总结

国有资本高质量发展能提升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强弱能深刻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要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与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结合当前国家对国有资本发展方向的判断与选择,本文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具体路径。

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强国有资本,需要让国有资本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依照市场规律来运营。硬化国有资本的预算约束,通过多种实现形式来增值国有资本,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并推进政府规制改革,是促进国有资本接受市场竞争锤炼、真正做强自身的重要途径。做优国有资本,需要合理确定国家和国有企业(资本)的边界,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国有资本职业经理人选拔与激励机制,并优化国有资本产业结构布局,提升国有资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资本积累特别是资本集中是做大有国有资本的基本途径,而混合所有制是实现资本集中的具体形式。在此过程中,也要建立相关机制来防止国有资本“化公为私”“脱实向虚”以及资本无限制扩张问题,让国有资本做大在一个良性有序的环境中展开。

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不是相互割裂的。做强是强调国有资本做大的外部治理机制,即通过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适当给予国有资本一定的经营压力。这种压力是推动国有资本做优做大的外部动力。在这种压力下,国有资本具有了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合理化国有资本产业布局的激励。这种做优行为反过来又有助于做强国有资本在市场的竞争力,并通过良好的市场化运作做大国有资本,进而让民营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做优国有资本就是通过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来做强做大国有资本。做大国有资本是国有资本做强做优的自然结果,而且国有资本的做大又进一步提高了国有资本抗风险、投研发、增利润的能力,为国有资本的进一步做强做优提供了条件。所以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三个方面在时间顺序上既有先后也有交叉,是国有资本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经营目标和衡量标准。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中可知,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并不以削弱民营经济为代价,而是在公平竞争中与民营资本共同发展的。特别地,国有资本可以促进国家能力的提升,为民营资本的长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530页.

期稳定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紧密结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通过合理的途径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可以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更为凸显。

[参考文献]

- [1][美]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2][美]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何畏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3]Besley, T., and T. Persson. State Capacit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J]. *Econometrica*, 2010, 78(1):1-34.
- [4]Fukuyama, F.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 [5]Laffont, J. J., and J. Tirole. *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3.
- [6]Laffont, J. J., and J. Tirole. *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The Path of State-owned Capital Becoming Stronger, Better and Bigg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air Competition——The Application of Marx's Capital and Market Theory

HONG Yin-xing, GUI Li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s, focusing on how to make state-owned capital stronger, better and bigger through market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air competition.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supports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Strong national capacit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providing excellent social public goods, solving many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s, and suppor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state-owned capital is the basic way to strengthen n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Fair competition in market economy has three constraints on state-owned capital: budget constraint, property right constraint and market position constraint. To make state-owned capital stronger, better, and bigger, we need follow the natures of capital and rely on the law of market. To become excellent players in the marke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do their job by careful selections, which can make the state-owned capital stronger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The improvement of state-owned capital requires not only standardizing the state's behavior as the owner of state-owned capital, but also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selecting and encouraging entrepreneurs. Through capital accumulation, especially capital concentration, state-owned capital can be expanded quickly. Mixed ownership is a specific and effective form to realize the expans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But we should also establish some mechanisms to prevent the state-owned capital from "grabbing-hands", economic bubbles and unlimited expansion of capital. The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ement of state-owned capital does not come at the cost of weakening the private economy, but rather complements the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ement of private capital in fair competi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state-owned capital; national capacity; stronger, better and bigger

JEL Classification: M11 P21 P31

[责任编辑: 覃毅]